

黄立一◆著

唐宋诗的 古今分合

以清代唐宋诗学转向
与当代唐宋诗整体观为视点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黄立一◆著

唐宋诗的 古今分合

以清代唐宋诗学转向
与当代唐宋诗整体观为视点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宋诗的古今分合：以清代唐宋诗学转向与当代唐宋诗整体观为视点 / 黄立一著. — 北京：九州出版社，2019.5

ISBN 978-7-5108-8083-4

I. ①唐… II. ①黄… III. ①唐诗—诗歌研究②宋诗—诗歌研究 IV. ①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99582号

唐宋诗的古今分合：以清代唐宋诗学转向与当代唐宋诗整体观为视点

作 者	黄立一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 68992190/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北京九州迅驰传媒文化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6 开
印 张	17.25
字 数	270 千字
版 次	2019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8083-4
定 价	6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许 总

二十一世纪伊始，余应华侨大学之邀，负笈南下，执中文教席。余向以为，习古代文学，其中诗为大端，若不谙此道，终致隔膜，因在教学之中，力倡诗词写作。不意在当时 2000 级本科生交来的作业中，竟有数人熟稔诗技，其中翹楚，即为立一。后对该生多加留意，发现其不独稟性聪颖，且品行极为厚朴，颇有获璞玉浑金之喜。

立一本科毕业后，以优异成绩获推免资格，从余攻读硕士。攻硕期间，其好学深思之性稟更为显现，学位论文以翁方纲诗学为题，颇有发明。硕士毕业后，又因学业优异而留校任教，旋即升任古代文学教研室主任，为余上司矣。其时立一于繁重教学及行政事务之余，学术之志不移，复从上海大学董乃斌先生攻读博士，由是学业日进，专攻益精。

立一志在唐宋及明清诗学，意在打通唐风宋韵之流衍与明清诗学之接受。在攻读硕博期间，即多有创获。今复以《唐宋诗的古今分合》为题，欲进一步探讨由清代唐宋诗学转向到当代唐宋诗整体观建构之诗学进程。题旨宏大，难度亦巨。立一初以此题与余相商，余即表不宜作之意。然其仍以不畏之毅力，终成其事，实可嘉也。嘱余弁言，因略叙师生因缘及学术旨趣，并期其更多力作问世。

戊戌年除夕于华园抱一轩

前言

自从南宋末年唐音宋调基本定型之后，唐宋诗之争就开始了它的千年诗学历程。前有张戒对苏、黄诗的批判及陆游、杨万里等对江西诗派的反思，宋末严羽更是推崇“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①的盛唐诗，自此历蒙元而至明代，宗唐始终是诗学主流，以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的明“前后七子”甚至提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②的主张。直到清代，宗唐思潮才有所松动，正如乔亿在《剑溪说诗》卷下所云：“明代诗人，尊唐攘宋，无道韩、苏、白、陆体者。国朝则祖宋祧唐，虽文章宿老，宋气不除。”^③不过且不论“攘”与“祧”一字之差的深刻差异，通观整个古代诗学史，宗宋思潮取代宗唐思潮也是在乔亿之后的清中叶，具体地讲是由于翁方纲“肌理”说深层内涵的转变而产生的直接影响。这一转向影响深远，在此之后，宗宋思潮成为主流，直到晚清的“同光体”仍标举宋诗的巨囊。其影响所及，甚至包括朱自清、程千帆、钱锺书等近现代学人。因此，观照唐宋诗的古今分合，“肌理”说的孕育产生是一个颇值得注意的节点。

不过到了晚清，唐宋诗分疆别垒的色彩逐渐淡化，即如“同光体”的理论家陈衍也已经从诗史的角度更通达地看待唐宋诗之争。其谓：“盖余谓诗莫盛

① 严羽《沧浪诗话》，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7页。

② 《明史·文苑传》：“梦阳才思雄鸷，卓然以复古自命。弘治时，宰相李东阳主文柄，天下翕然宗之，梦阳讥其萎弱，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非是者弗道。”《明史·王世贞传》记载：“其（王世贞）持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大历以后书勿读。”

③ 郭绍虞编选，富寿荪校点《清诗话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106页。

于三元，上元开元，中元元和，下元元祐也。君谓三元皆外国探险家觅新世界殖民政策开埠头本领，故有开天启疆域云云。余言今人强分唐诗宋诗，宋人皆推本唐人诗法，力破余地耳。庐陵、宛陵、东坡、临川、山谷、后山、放翁、诚斋，岑、高、李、杜、韩、孟、刘、白之变化也。简斋、止斋、沧浪、四灵，王、孟、韦、柳、贾岛、姚合之变化也。故开元、元和者，世所分唐宋人之枢幹也。若墨守旧说，唐以后之书不读，有日蹙国百里而已。故有唐余逮宋兴，及强欲判唐、宋各云云。”^①前如吴乔所谓的“宋人惟变不复，唐人之诗意尽亡”^②，虽亦具诗史眼光，但却有割裂唐宋的意味，相比之下，陈氏更有将唐宋弥合一体的倾向。同样，其后的“诗界革命”派人士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继承书写性灵的传统精神，也反对诗分唐宋。黄遵宪云：“夫声成文谓之诗，天地之间，无有声皆诗也，即市井之漫骂，儿女之嬉戏，妇姑之勃谿，皆有真意以行其间者，皆天地之至文也。不能率其真，而舍我以从人，而曰吾汉吾魏吾六朝吾唐吾宋，无论其非也；既刻画求似而得其形，肖则肖矣，而我则亡也，我已忘我，而吾心声皆他人之声，又乌有所谓诗者在耶？汉不必三百篇，魏不必汉，六朝不必魏，唐不必六朝，宋不必唐，惟各不相师，而能成一家言。”^③其与清初邵长蘅所谓“盖宋人实学唐，而能遯逸唐轨，大放厥词。唐人尚蕴藉，宋人喜径露。唐人情与景涵，才为法敛。宋人无不可状之景，无不可畅之情，故负奇之士不趋宋，不足以泄其纵横驰骤之气，而逞其贍博雄悍之才”^④看似相近，实则已注入新的时代内涵，或体现出某种进化论的思想。其派中人金天羽《五言楼诗草序》云：“诗至今日，难言之矣。创作者恶夫袭古人之貌，务破弃一切而为新制，其体乃不离乎小词俚曲之间；而泥古者则又规仿唐宋，标举一二家以自张其壁垒，师古而不能驭古。是故师昌黎者悍，师香山者庸，师皮、陆者碎，师玉溪者淫，师张、王乐府者佻，师眉山者甜与熟，师山谷者取侧笔，师后山者用秃笔，师剑南者浮泽宕往而无归宿。又其甚者，举一行省十

① 陈衍《石遗室诗话》，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4 页。

② 吴乔《围炉诗话》，郭绍虞编选，富寿荪校点《清诗话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471 页。

③ 黄遵宪《黄遵宪集》，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412 页。

④ 《研堂诗稿序》，邵长蘅《青门簏稿》卷四，《常州先哲遗书》本。

数缙绅，风气相囿，结为宗派，类似封建节度，欲以左右天下能文章之士，抑高唱而使之暗，摧盛气而使之绌，纤靡委随，而后得列我之坛坫，卒之僇薄者得引为口实，而一抉其藩篱，诗教由是而隳焉”^①，则展示出对诗坛以唐宋为界分立门户的蔑弃。

现代学人主张诗分唐宋者以钱锺书先生和缪钺先生之论最有代表性。钱先生云：

唐诗、宋诗，亦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格性分之殊。天下有两种人，斯分两种诗。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严仪卿首倡断代言诗，《沧浪诗话》即有“本朝人尚理，唐人尚意兴”云云。曰唐曰宋，特举大概而言，为称谓之便。非曰唐诗必出唐人，宋诗必出宋人也。故唐之少陵、昌黎、香山、东野，实唐人之开宋调者；宋之柯山、白石、九僧、四灵，则宋人之有唐音者……且又一集之内，一生之中，少年才气发扬，遂为唐体，晚节思虑深沉，乃染宋调。若木之明，崦嵫之景，心光既异，心声亦以先后不侔。^②

缪先生云：

唐宋诗之异点，先粗略论之。唐诗以韵胜，故浑雅，而贵蕴藉空灵；宋诗以意胜，故精能，而贵深折透辟。唐诗之美在情辞，故丰腴；宋诗之美在气骨，故瘦劲。唐诗如芍药海棠，华茂繁采；宋诗如寒梅秋菊，幽韵冷香。唐诗如啖荔枝，一颗入口，则甘芳盈颊。宋诗如食橄榄，初觉生涩，而回味隽永。譬诸修园林，唐诗则如叠石凿池，筑亭辟馆。宋诗则如亭馆之中，饰以绮疏雕槛，水石之侧，植以异卉名葩。譬诸游山水，唐诗则如高峰远望，意气浩然。宋诗则如曲涧寻幽，情境冷峭。唐诗之弊为肤廓平滑，宋诗之弊为生涩

① 金天羽《天放楼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861页。

② 钱锺书《谈艺录》，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4页。

枯淡。虽唐诗之中，亦有下开宋派者。宋诗之中，亦有酷肖唐人者。

然论其大较，固如此矣。^①

就这两段话而言，二位先生所云各有侧重。钱先生从人性角度或者说人生的发展阶段解读唐宋之异，缪先生则更多是从风格、做法以及予接受者的感受等角度谈二者差别，都讲得十分透彻且深刻。二位先生并云唐宋诗不能拘泥地以时代为限，唐人中有做宋诗者，宋人中有做唐诗者，唐宋诗更重要的是基于创作手法、美学风格乃至人性特点而产生的两种古代诗歌范型。这样看来，唐宋诗的产生及其差异的存在在人性 and 文艺创作原理、文学史发展规律的层面是有必然性的。

唐宋诗之争在古代走过它曲折的诗学道路，其实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两种不同的诗歌范式、诗人类型、诗美追求的分野，乃至基于不同立场对文学本质理解的差异。因此，它已然超越了唐宋诗的范围，具有更深层次的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理论史的意义。而在今天的视野观照下，唐宋诗在古代诗歌发展史上又是以一个独特的身份而存在的，那就是成熟的文人诗。自汉末开始出现的文人吟唱至此汇为洪流，蔚为大观并凝定为两种基本范式。不仅如此，唐宋诗的发展又自成一个自足的逻辑进程，从诗体构建和诗美历程的角度观察可以发现唐宋两代的诗歌处于某一共同进程之中，唐宋诗人的尚奇追求也在某种程度上设定唐宋诗史的演进逻辑，相比于之前的汉魏六朝及之后的元明清诗歌显示出某种同质化的倾向，或者说是文学史上的一体化特征。或许，从这样的角度出发，今天的我们能超越古人的唐宋诗之争，也一定程度上弥合近人诗分唐宋的看法，彰显出我们这个时代的诗学关怀。

本书就试图截取翁方纲“肌理”说促成的清中期由宗唐变为宗宋的诗学转向与当代基于诗体建构、诗美历程及两朝诗人合乎逻辑的“尚奇”追求演变得出的唐宋诗整体论这两个典型截面和重要节点，阐述唐宋诗之争的古今分合，以一种新的视角看待这个千年诗学公案和命题，并以开放的姿态迎接未来的重新诠释。

^① 缪钺《论宋诗》，缪钺《诗词散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36—37页。

目 录

前 言	1
上 编 翁方纲“肌理”说与清中期宗唐宗宋的思潮转向	
第一章 “肌理”说的内涵和体系	3
第一节 “肌理”说的性质	5
第二节 “肌理”的内涵	10
第三节 “肌理”说的体系	19
第二章 “肌理”说产生的时代文化背景	52
第一节 崇儒思潮的价值观	52
第二节 乾嘉经学的方法论	61
第三节 宗宋诗学的初萌	71
第三章 “肌理”说与清中期诗学思潮转向	80
第一节 清中期诗学转向	80
第二节 翁方纲与宋诗派的兴起	88
第三节 “肌理”说的诗学史意义	99

下 编 当代视野下的唐宋诗一体进程

第一章 唐宋时代的诗体建构	111
第一节 近体的确立与新变	111
第二节 古体歌行的多向发展	131
第三节 篇章体制的精心锤炼	157
第二章 唐宋诗的美学进程	170
第一节 正态美的极致	170
第二节 变态美的追寻	182
第三节 审美境界的深化	198
第三章 “尚奇”观与唐宋诗史的演变	218
第一节 作为诗学概念的“奇”	218
第二节 唐宋诗人的“尚奇”之风	221
第三节 “尚奇”在唐宋诗史的演变成因	225
附录一 许总《唐宋诗体派论》读后	231
附录二 王维五律的文学史意义	237
参考文献	254
后 记	263

上 编

翁方纲“肌理”说与 清中期宗唐宗宋的思潮转向

唐宋诗之争历经千年，本编试图探讨翁方纲“肌理”说对古人由宗唐整体上转向宗宋这一重大诗学思潮转向所起到的关键作用，不仅分析其诗说具有哪些独特内涵，为何较之其他宗宋诗人的学说理论能有更为关键的转折意义，也梳理翁氏与之前之后宋诗派成员的关系，其学说发挥影响的途径，以及其诗说促使宗唐宗宋思潮转向的事实，以此作为观照唐宋诗古今分合的一个截面。

第一章 “肌理”说的内涵和体系

翁方纲，字正三，号覃溪，晚号苏斋，直隶大兴（今属北京）人，生于雍正十一年（1733年）。在科举求仕的道路上，翁方纲可以说是一个幸运儿。早在乾隆九年（1744年）六月，他十二岁即受到顺天学政、副都御史赵大鲸的赏识，成为秀才，故有神童之目。三年后的乾隆十二年（1747年）秋天，即他十五岁时，又受到顺天乡试主考官、刑部尚书阿克敦、刘统勋的赏识，以第四十七名中举。此后，翁方纲开始在京师首善书院学习，为时七年。乾隆十七年（1752年）八月，因皇太后六旬万寿加乡会试恩科，翁方纲以一百十七名成进士，座师为陈世倌、嵩寿和邹一桂，随即被选为庶吉士。

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七月，翁方纲奉命出任广东学政。尽管是第一次就任此职，翁方纲还是做得不错，故在广东学政任上连任三届，直到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底才返回京师。由于学政主要工作为考核教职和考试生童，仅“掌学校政令，岁科两试。巡历所至，察师儒优劣，生员勤惰，升其贤者、能者，斥其不率教者。凡有兴革，会督抚行之”（《清史稿》卷一百一十六，《职官·提督学政》），办公时间比较自由，所以翁方纲在此期间开始研究自己喜欢的诗词学，并利用到各地按试的条件，搜集和研究当地流传的金石铭文资料，并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撰成《药洲诗话》六卷，随后增订为《石洲诗话》，与其在京所撰《韵字辨同》五卷同刊。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秋，翁方纲在广东撰成《粤东金石记》十二卷并刊行于世。这是翁方纲第一部重要的金石学著作。

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底，翁方纲完成广东学政工作返回北京。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初，纂修《四库全书》工程正式开始。三月十八日，翁方纲因“留心典籍，见闻颇广”（《翁氏家事略记》，乾隆三十八年条），被大学

士刘统勋等人推荐为《四库全书》纂修官，入翰林院修书。同年撰成《焦山鼎铭考》一卷和《苏诗补注》八卷。当时《四库全书》馆汇集了几乎全国所有的一流学者，先后参与其事的有程晋芳、姚鼐、任大椿、朱筠、钱大昕、张埏、陈以纲、孔广森、桂馥、黄易、赵魏、陈焯、丁杰、沈心醇、纪昀、戴震、劭晋涵、周永年、陆锡熊等数百人。在编书过程中，他们“时相过从讨论，如此者前后约将十年”（《翁氏家事略记》，乾隆三十八年条）的经历，对包括翁方纲在内的所有学者的学术研究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九月，翁方纲奉命提督江西学政，至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九月返回。期间，于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十二月著成《十三经注疏姓氏》，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八月撰成其最主要的金石学著作《两汉金石记》二十二卷，并刊刻行世。该书被后人评价为“剖析毫芒，参以《说文》《正义》，考订至精”（《清史稿》卷四百八十五，《翁方纲传》），从而奠定了他作为清代金石学名家的地位。

或因其于乾隆后期长期办理批本所致，嘉庆六年（1801年）二月，翁方纲被发往高宗乾隆帝的裕陵守陵三年。在马兰峪的三年，翁方纲因无所应酬，专心将数十年来研究诸经所记心得进行整理，先后整理出《易附记》十六卷、《书附记》十四卷、《诗附记》十卷、《春秋附记》十五卷、《礼记附记》十卷、《大戴礼附记》一卷、《仪礼附记》一卷、《周官礼附记》一卷、《论语附记》二卷、《孟子附记》二卷、《孝经附记》一卷、《尔雅附记》一卷，并完成《兰亭考》一书（原名《苏米斋兰亭考》）。

由于年事已高，加之被发往裕陵守陵一事的刺激，翁方纲自马兰峪返回后即未再做官，在家从事金石学等研究，成果见于《苏斋题跋》以及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撰成的《庙堂碑考》《秦篆残字记序》等论文。有关经学及学术研究方面的著作主要有：大约在嘉庆十七年前后撰成的《考订论》系列九篇论文，以及《自题校勘诸经图后》《读李穆堂原学论》《原学》《姚江论致良知论》等论文。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正月二十七日，翁方纲在家中去世，享年八十五岁。^①

① 以上参考《清史稿》及陈连营《翁方纲及其经学思想》，《故宫博物院院刊》2002年第6期。

翁方纲不仅在经学特别是金石学上成就斐然，他对诗学的精研和探究也不同于庸众，在他所著《复初斋诗文集》及《石洲诗话》等论著中，可见其论诗主张。而且，正是因其在经学、金石学方面的深厚学养，造成了翁方纲诗论的独具特征，成为“学人诗论”之代表。在清代这个被郭绍虞先生称为文学批评集大成的时代，各种诗学流派层出不穷，异彩纷呈，翁方纲的“肌理”说得以和“格调”“神韵”“性灵”三说并立为清代四大诗说，可见其在清代诗学中的地位和重要性。当我们系统地对“肌理”说进行考察，领会其深刻内涵，并对清代乃至中国近古整个诗学概貌有所了解，就会发现“肌理”说在整个清代中期诗学思潮转向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以及引发的深远影响，并且可以更深刻地理解翁方纲的诗学理论在中国古典诗学终结时代所具有的特殊意义。

翁方纲诗论以“肌理”说为核心，在清代诗学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产生过重要的影响，有其不可低估的价值。但是，这个出现在封建社会末期的诗说到底是以什么样的面目出现的呢？它的本质内涵究竟为何？它是否可以自成一个体系？解读这些问题无疑是充分认识其意义和价值的基本前提。

第一节 “肌理”说的性质

在中国古典诗学发展史上，儒家思想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这一点已成为论者之共识。萧华荣先生在《中国诗学思想史》中说：“中国传统诗学思想可以宋代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先秦至唐属前期，宋至清末属后期，与儒家经学期与理学期大致相合。这种相合并非偶然，而有着内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这也可以看出儒家思想在诗学思想发展演变中的主导地位”^①，就用一个很显明的事实证明了这个论断。而在儒家诗学中，最重要、最具特色并且影响最大的范畴应该说是“诗教”。早在中国诗歌发展的初期，也即在《诗经》的时代，诗歌就成为王者之治道的一个组成部分，被组织在政治架构当中，发挥政治教化作用。诗人用诗歌歌咏自己的情感，发表对社会政治的意见；统治者通过采诗、观诗来了解民风，并用诗歌教化民众。诗歌在这个架构中不仅可以用

^① 萧华荣《中国诗学思想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7页。

以美、刺，而且可以用以观、教，诗人以诗进行美刺，统治者采以观教，这两种功能是相辅相成的，这应该是存在于先秦一段时间里诗歌的政治教化作用的实况，儒家诗学教化观的形成就是对这种实况的概括与总结。虽然其中也有想象和比附的成分，不过不管怎样，在传统的儒家学者看来，诗是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政治作用的，朱彝尊的一番话可以说是这种观点的总结：

诗之为教，其义风赋比兴雅颂；其旨兴观群怨；其辞嘉美规诲戒刺；其事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其效至于动天地，感鬼神。^①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代有其人，稍后的沈德潜就是众所周知的儒家诗教的极力倡导者，同样，翁方纲也是力主“诗教”的一个代表。他说：

诗者忠孝而已矣，温柔敦厚而已矣，性情之事也。秋谷之论诗，其于渔洋孰正孰畸，姑无辨，第其意在于齟齬渔洋而已，使学人由此长傲而启矜焉。性情之谓何？温柔敦厚之谓何？愚所以不敢不辨也。^②

在《杜诗“熟精文选理”“理”字说》中又说：

天下未有舍理而言文者，且萧氏之为《选》也，首原夫孝敬之准式、人伦之师友，所谓“事处于沉思”者，惟杜诗之真实足以当之，而或仅以藻绩目之，不亦诬乎？^③

① 《高舍人诗序》，朱彝尊《曝书亭集》卷三十九，世界书局1937年版，第468页。

② 《渔洋诗髓论》，翁方纲《七言诗三昧举隅》附录，王夫之等撰《清诗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304页。

③ 翁方纲《复初斋文集》卷十，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第408页。

这种种言论无不证明翁氏提倡儒家诗教，因此可以说翁方纲的诗说是儒家诗教在清代的延续。

但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事实上，古代诗歌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渐从实际政治架构中脱离了出来，采诗、观诗早已不复存在，对于统治者来说，也不会把当代诗歌作为观民风 and 施行教化的工具，随之带来的结果就是诗人也不复把诗作为美刺的工具，后世固然有像白居易那样孜孜于讽谏者，但他已不能保证统治者采以观之了。所以尽管历代像杜甫、白居易一样秉持儒家诗学的政教精神来创作的诗人层出不穷，但儒家诗学所谓的政教传统只作为一种精神传统存在，而不再落实到现实政治制度的层面。然而我们前面提到的沈德潜却恰恰是这样一位力图挽回诗教传统，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学者，他在《说诗晬语》开宗明义：“诗之为道，可以理性情，善伦物，感鬼神，设教邦国，应对诸侯，用如此其重也。”^①在《古诗三章答计维严》之三中又说：

文章起颓波，滔滔荡无底。行水遗其源，泛滥何时已。之子绍家学，清词通妙理。已涉六代藩，言究风骚旨。导河自积石，治雍终弱水。大雅期复作，扶轮自兹始。非君谁与言，顾我将老矣。^②

其理想之执着、言词之恳切以及对后进的殷殷期待都使我们不禁为之动容，但是，这实在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主张，是“一种不合时宜的理想主义”^③，生前享有尊荣的沈德潜本人在死后也被乾隆帝下令夺谥，推倒墓碑，这充分说明了儒家庄严的理想主义在现实的政治专制前的无能为力。

当传统的诗教到沈德潜时已被彻底地证明了它的不可行性，那么，摆在翁方纲面前的问题就是如何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贯彻儒家诗学的精神，发挥儒家诗教的作用。正是在这个时候，对儒家经典的研究有了新的发展，那就是经学在清代的复兴，翁方纲抓住这个时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促成了儒家诗学的转换

① 王夫之等撰《清诗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926页。

② 沈德潜《归愚诗钞》卷四，清乾隆十六年刊本。

③ 张健《清代诗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19页。